

## 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

易海涛

1963年至1966年，上海共动员近10万名知青支援新疆建设，其中绝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周恩来在上海知青动员、安置和巩固的各个阶段，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 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的开启

据原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回忆，1963年，刚从北京开会回到上海的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找他谈话。曹荻秋告诉张浩波，他在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他三个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讨论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动员两三万知识

青年去支援新疆兵团。得知这件事情后，经认真讨论研究，基本将事情确定下来。在上海知青援疆的历史过程中，城市青年安置问题、新疆的战略地位、上海青年的成长是三个重要因素。

### （一）对城市青年安置困难问题的长期关注

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开始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学习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

的青年。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持续推行，并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被首次完整提及。9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公室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

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简小组宣布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断完善，并持续深化。在此之前，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召开六大区领导此项工作的小组长会议。周恩来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十五年安置规划”。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无法安置的青年问题更为突出。8月21日，上海市劳动局在《关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

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 （二）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日，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谈话。据张仲瀚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张仲瀚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八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瀚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瀚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考虑到周恩来日理万机，过了一些时日后，当张仲瀚刚乘飞机到兰州时，他就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电话，叫他次日回京，因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

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2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便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日在给杨尚昆的批语中指出：农垦四师、十师、七师均在边境线，

他已经要张仲瀚 27 日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三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 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五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五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今阿勒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 日，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 年 7 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四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两天。周恩来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作了六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

### （三）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

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 年 8 月 13 日，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五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 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

青年。周恩来在 195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明确指出，在学校教育中要加强教师和学生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张浩波清晰地记得：“解放前后上海的社会风气是历来看不起农民，盛行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思想。”因此，中央非常注意对这种错误思想的改造。1957 年 12 月 23 日，周恩来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

## 周恩来与上海知青的动员、安置和巩固

1963—1966 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 （一）动员

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 1963 年 12 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 32 万人（其中，停学待业、闲居在家的有 2 万人），占青年总数的 23.27%。到 1964 年 11 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包括知识分子）占到 70%。但是，不

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在奶油色的房子里，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说”；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

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日，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连，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触动。鱼珊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一师，经过近两年成长，她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22日，《中国青年报》就鱼珊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其实，早在5月10日，《光明日报》在报道上海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参加农业建设时便提到了鱼珊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例。显然，《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受到了周恩来谈话的影响，其标题也更加突出“出身”和“道路”这一主题。

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就此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鱼珊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1965年8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淑荃、郑月华、卓爱玲、亓毓纯、朱兆华、张立勇、雍凤兰七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 （二）安置

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

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同时也在不断调整。1963—1965年，1000元每人（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500元每人。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改为400元）。早在当年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七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

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减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

1963—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万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

### （三）巩固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故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

量照顾这些青年。

1965年7月5日下午4时许，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一分场六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边同青年们握手，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同时，周恩来还关心上海青年的成长，并专门提到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情况，要求大家把共青团的活动搞起来。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长，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按中便指出：这七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日周恩来总理



1965年，周恩来和陈毅视察石河子农垦区

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作出最大的贡献。”

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日，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此提议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批准。8月12日至11月13日，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前后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11月6日，在上海市慰问团向新疆兵团汇报慰问情况的会议上，宋日昌开门见山便提出“兵团要上海支援什么”。同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祁果在与宋日昌的谈话中明确，上海要进一步为新疆提供相应的支援，除上海劳动青年外，还有技术、物资设备等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程被打乱。1966年10月8日，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准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当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

新疆的意见》，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进程宣告结束。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市，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据1967年7月1日，中央安置办公室来访接待站提供给周恩来的报告显示：“自当年5月以来，进城的下乡知青已达40万人以上；在中央各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中尤以新疆为首。”为此，周恩来一方面不断呼吁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就地闹革命，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具体政策落实下乡知识青年的返乡工作。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在此背景下，上海和新疆双方都积极动员知青返疆，新疆兵团还通过派出工作组赴沪动员上海青年返回新疆。1967年2月，由农二师、农一师、工一师、农五师等单位抽调人员从新疆来沪，与黄浦区挂钩，动员上海青年返回新疆。对此，上海市劳动局、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也对其提供经费支持。该组织于4月12日结束工作，并与在



1965年，周恩来在石河子垦区与上海支边青年亲切交谈

沪的600余名青年一起返疆。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回到新疆后，继续在新疆奋斗。

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1973年4月26日至27日，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两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场、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有1万多名支边青年参加），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援疆知青陈雪琴仍记得周恩来接见他们的情景：“他和我们唠家常，并勉励我们扎根边疆开花结果。记得总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根冰棍，大家光顾和总理说话，冰棍都化在手里了也没想起来吃。”杨永青认为：“周总理接见我以及其他几位上海知青，是总理对全国知青发展关心的重要体现。而总理的接见也一直对我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让我一直坚守在边疆、不断求上进。”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亲力亲为，也在广大上海支疆知青的心中留下了不可



位于新疆石河子的周总理纪念碑

磨灭的印象。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为缅怀周恩来，新疆石河子总场党委提议，在周恩来当年接见部分干部和上海知识青年的地方修建一座纪念碑。此提议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并于1977年春开工建设。7月1日，工程顺利结束，总高12.8米的周总理纪念碑高高伫立。其中，碑身高7.8米，是周总理逝世时78周岁的纪念。碑文高为6.7米，那是周总理67周岁时视察石河子的象征。纪念碑背面写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于1965年7月5日来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视察，在此处接见干部和上海知识青年代表，特立碑永做纪念。”1978年，周恩来总理纪念馆在此基础上建成。（责任编辑 崔立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新疆人口工作与边疆长治久安研究”（21CDJ021）阶段性成果 ]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副编审